

个人资本视域下的劳动力移民 城市贫困研究

张学英

(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天津 300222)

摘 要:中国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遭遇“制度藩篱”,该劳动力移民群体与城市制度内人口、知识移民和财富移民相比,个人资本水平低是其在城市贫困的致因。通过个人资本积累能够消除劳动力移民贫困。

关键词:乡—城劳动力移民;贫困;个人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8)12-072-075

中国在改革初期只有少量乡—城迁移者——“盲流”,到 20 世纪末则出现了大规模乡—城迁移现象,称为“民工潮”。伴随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并长期居住在城市,他们又被称为劳动力移民,^{[1](P28-30)}工人、农民和城市新移民构成了中国特有的“三元”社会阶层结构。^{[2](P35-40)}然而,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中国的劳动力移民两栖于城市和农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劳动力流动与移民过程并不同步,其在城市处于“做活”而无“生活”的生存状态。

一、劳动力移民在城市的贫困化

1. 贫困向城市集中

胡永和认为,发达国家漫长的城市化过程使其有充裕的时间逐渐建立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应对城市化中的问题。反之,发展中国家迅速的城市化过程遭遇人口增长率高、人均收入低以及国际移民机会少的局面,遇到了发达国家未遇到的难题,其中最严重的是贫困向城市集中。约翰·哈里斯和迈克·托达罗(John R. Harris, Michael P. Todaro)的研究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会引起新的失业,在二元结构严重的国

家,尽管城市存在失业,农村人口在追求高工资工作机会的驱动下仍会不断涌入城市,加深城市贫困的程度。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指农村贫困,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关注城市贫困。目前中国城市的贫困人口统计并不包括贫困劳动力移民群体,故表面看来贫困并未向城市集中。^{[3](P87-90)}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边缘化和贫困化是不争的事实,其贫困发生率比城市人口高 2 倍多。^[4]如果将流入城镇务工不着或被辞退或无经济收入极端贫困的农民工统计为城市贫困人口,城市贫困规模会加大。

2. 劳动力移民贫困的特征

本文根据中国目前划定的贫困线衡量劳动力移民的收入以分析其贫困的特征。中国现有的农村贫困线和城镇贫困线相差很大,农村贫困线是 635 元/年/人,而城镇贫困线大体是 1800 元/年/人,城镇约是农村的 3 倍。

与农村人口相比,劳动力移民的收入普遍高于农村贫困线,他们并非贫困群体,故以农村贫困线来评价其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大部分人势必被遗漏在城市贫困人口之外。与城市制度内人口相

作者简介:张学英,女,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本)。

比,其收入水平不一定绝对低于城镇贫困线,但他们却无力支付在城市的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和维持拥有最低限度尊严的生活,因此又是低收入群体。如果以住房状况、工作状况、消费水平和公共服务为贫困指标体系,^{[5](P17-21)}劳动力移民的住房面积低于当地平均水平,配套不齐全,环境状况差;多从事当地较低收入的行业和职业,工作缺乏稳定性;其消费水平显著低于当地平均消费水平;很少或不能得到当地政府所提供的技术培训、就业机会、生活保障等服务或其他相关政策的支持,包括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机会等。可见,劳动力移民是相对贫困群体,农村贫困线和城镇贫困线都无法准确衡量其实际贫困状态。虽然表面上中国的反贫困政策覆盖了农村和城市,但是,在城市从事非农就业却拥有农村户籍的劳动力移民,既不能受惠于农村的反贫困政策,又被排斥在城市贫困政策之外,成为政府反贫困政策的空挡。

劳动力移民贫困群体比城市制度内贫困群体的贫困程度更深。^[6]亚洲银行针对中国城市贫困所做的调查表明,流动人口的贫困率比城镇常住居民高 50%。城市中劳动力移民贫困群体规模大致在 1500 万人左右,若将其家属计算在内,该群体甚至不低于 4000 万人。^[7]

二、劳动力移民贫困的原因

1. 已有贫困与反贫困研究

分析贫困致因的方法有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97)的可行能力法和法国学者拉诺尔(Ren Lenoir, 1974)的社会排斥法。阿马蒂亚·森注重个体差异,强调贫困是收入与物质缺乏或其他因素造成的个体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拉诺尔的社会排斥法则强调贫困状况与群体、社会结构、制度、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联,将分析重点从个体转移到社会关系与制度上。社会排斥丰富了贫困概念的内涵,强调贫困不仅是收入低下与物质资源缺乏的状况,而且还包括人的社会需求与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况,如文化歧视、群体排斥、社会隔离、权利缺乏,等等。国内对劳动力移民贫困致因的分析多采用社会排斥法,李裕林等从劳动力市场歧视、户籍制度障碍和社会保障制度缺陷、贫困心理、权利贫困等视角分析了其在城市致贫的原因。

相应地,反贫困研究也呈现出两条路径:以人力资本投资反贫困与以社会制度和政策变革反贫

困。舒尔茨(Schultz, Theodore W., 1961)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人力资本投资机会遭到挫折的结果,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因素是改善穷人的质量。目前,通过教育、培训、医疗、流动等赋予贫困者以人力资本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反贫困对策。阿马蒂亚·森认为,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不仅能直接改善生活质量,同时能提高获得收入、摆脱贫困的能力。国内的劳动力移民反贫困研究多采用社会排斥法,重点关注贫困救助和社会保障机制、社区融入问题,以社会政策创新反贫困等。

综上所述,对劳动力移民贫困的研究有待深入:(1)对劳动力移民贫困问题缺乏系统的研究,该群体是政府反贫困政策的空挡。(2)对劳动力移民贫困原因的分析多采用社会排斥法,注重宏观、中观分析,但基于个体可行能力的微观分析很少。本研究从微观视角展开,指出在当前政府不断推动制度和政策变革的背景下,制度性排斥的硬约束将逐渐消失,劳动力移民个人资本水平将成为其能动性地走出贫困的关键约束条件。

2. 个人资本匮乏导致劳动力移民贫困

已有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匮乏是乡-城劳动力移民贫困的致因,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遭遇“制度藩篱”。本文则认为,贫困首先是特定人群智力结构的低层次性(绝对和相对两种),其次才是不利的外部环境叠加在低层次智力结构上导致的收入不足,贫困是人力资本短缺到不足以持续地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维持基本生存所需收入的状态,故人力资本贫困也是其贫困的要因。

此处的个人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层面。其中,社会资本是能够产生利益的资源,能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能力。基于劳动力移民的相对贫困特征,本文中的个人资本仅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流动性是中国劳动力移民群体最明显的特征,职业流动与地理—社会空间流动是其在城市发生贫困的重要原因。^[8]职业流动和地理空间流动可能引发其在可行能力方面的贫困,包括在非农就业的必要技能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知识与能力方面的不足。社会空间流动则可能诱发其在城市的社会资本贫困。

三、人力资本贫困与可行能力不足

1. 人力资本贫困导致可行能力不足

人力资本指寓寄在劳动力身上,通过后天获

得的,能够增加未来收入或满足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9](P168-170)}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可行能力相对越强,从现有社会环境中获得就业机会的能力越强,经济生命周期内的收入流越大,贫困化的概率越小;反之,亦然。

2. 劳动力移民的人力资本现状

以农村留守劳动力、城市制度内人口、知识移民和财富移民为参照群体:(1)相对于农村留守劳动力,劳动力移民的综合素质较高,是“精英”。(2)相对于城市制度内人口,劳动力移民却是个人资本匮乏的“弱势群体”。低水平人力资本使其无法通过劳动力市场这一正式途径搜寻到正规部门的“好”工作,社会资本匮乏使其主要利用社会关系这一非正式途径搜寻非正规部门的“差”工作。(3)相对于其他移民群体,劳动力移民在城市立足困难。知识移民和财富移民分别通过毕业分配、财富投资等正式渠道移民到城市,劳动力移民则是非正式、非组织化的移民。同是外来移民,其人力资本水平比知识移民低,难以获得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与财富移民相比,其物质资本匮乏,不具备创业条件。总之,相对于劳动力移民,城市制度内贫困人口显然具有较高的社会资本水平,但却因低水平人力资本的制约难以在正规部门就业;而具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的知识移民易于获得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可见,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就业质量的关键要素。在目前劳动力移民贫困的前提下,财富移民路径不可行,惟有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消除其贫困状态。

劳动力移民的人力资本贫困主要表现为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职业流动引起的技能不足。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低,该群体大多在技能含量低的建筑、家政、清洁、工厂流水线等行业或职业就业。劳动力移民在低技能行业或职业的集聚导致该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这些行业或职业也成为贫困的多发地。在贫困化的压力和部分地区出现“民工荒”的背景下,劳动力移民渴望群体性地提升技能水平,但该需求却由于缺乏培训费用、缺少培训服务、缺乏培训时间等原因而得不到满足。

3. 以人力资本积累脱贫的路径

在当前制度变革推进缓慢的背景下,知识移民通过高水平人力资本转化为城市制度内人口、且在正规部门就业的路径为劳动力移民脱贫提供了路径支持。

(1)人力资本投资在反贫困中的作用。舒尔

茨认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从提高人口素质入手是使贫困群体脱贫的根本。人力资本投资指为提高人口素质而在教育、培训、健康、迁移等方面发生的支出。首先,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提高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来提升其劳动生产率。其次,该投资通过增强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来提高其就业能力,也为向高技能职业的跃迁奠定基础。第三,该投资有利于增加健康存量以减少疾病发生。健康存量增加提高了其市场工作时间,减少了医疗费用支出,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概率。第四,该投资可以改变贫困文化,提高思想素质,进而影响其行为选择,增强市场竞争、个人进取的意识,成为精神上的强者。

(2)劳动力移民积累人力资本的路径。政府在劳动力移民人力资本投资中肩负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首先,通过教育投资普遍提升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是未来劳动力移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其次,基于现有的中等职业教育禀赋,开展专门针对劳动力移民城市务工的职业技术教育,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为现代工业培养合适的人才,提升劳动力移民的职业层次,减少盲目流动和“回流”。^{[10](P20-22)}第三,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吸引企业提供在职培训、劳动力移民参与在职培训,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其就业稳定性。^{[11](P52-55)}第四,以政府为主导提升面向劳动力移民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增加其健康资本存量,减少因疾病而减少市场工作时间带来的货币收入下降。^{[12](P87-99)}第五,政府给以政策支持,帮助劳动力移民解决子女在城市的教育问题,彻底切断低水平人力资本进而贫困的恶性循环链条。

四、社会资本匮乏与社会排斥

1. 社会资本匮乏导致社会排斥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通过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13](P5-8)}社会资本匮乏是穷人丧失发展能力的原因,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存量而失去改变贫穷状态的能力。

社会排斥既是社会资本匮乏的结果,也是社会资本匮乏的原因。劳动力移民既是城市的“边缘人”,也是农村的“边缘人”,尤其是在城市,他们是受到社会排斥的群体。劳动力移民的职业流动和地理——社会空间的流动,尤其是地理——社会空间流动弱化了原有社会资本在其城市就业、

生活中的作用,新的社会资本的积累又由于被排斥而无法顺畅进行,故社会资本匮乏是其城市贫困的致因之一。

2. 以社会资本积累脱贫的路径

(1) 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Grootaert^[14]运用印度尼西亚的数据证实社会资本能显著减少贫困,被称为“穷人的资本”。世界银行在 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明确提出,要把支持穷人积累社会资本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之一。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最大的区别在于,社会资本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其中,社会网络是个人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它能提供信息共享、降低风险、减少交易成本;信任也具有外部性,它能促进合作、减少交易成本、弥补正式制度的缺陷^[15]。

(2) 劳动力移民积累社会资本的途径。劳动力移民具有经济来源缺乏、人力资本水平低下、健康状况偏差、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社会网络同质性高、社会交往障碍等特征,这直接导致其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提高自身竞争力以摆脱不利地位,需要依靠外力支持获得社会资本水平的提升。政府、社区和民间组织(团体)是提升劳动力移民社会资本水平的三大主体。第一,政府是推动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核心,可通过创造有利社会环境推动贫困者自组织、开拓阶层间的沟通渠道以增强阶层认同感、将实施社会保障与组织贫困者结合起来等措施提升其社会资本水平。第二,社区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联合国大力提倡而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反贫困的战略意图。社区代替村庄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础单元,^{[16](P82-85)}通过培育社区自组织建立贫困者的互助支持网络、推进社区参与以丰富贫困者的社会联系、发展社区服务以建立社区互助网络来提升其社会资本水平。第三,民间组织扶贫旨在创造发掘穷人自身潜力的机会与条件,高度重视穷人的参与和能力提高,旨在通过援助将其组织起来,形成互助支持的网络,促进其社会资本水平的提升,从而提高集体决策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五、主要结论

(1)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乡——城迁

移与常规移民模式不同,劳动力流动与移民过程并不同步,劳动力移民两栖于城市和农村,且在城市处于贫困状态。

(2) 从微观视角看,个人资本贫困是劳动力移民贫困的要因。个人资本水平低制约着其乡——城迁移和在城市的职业转换,因无法适应城市现代产业部门的需求而面临就业层次低和就业机会匮乏的窘境。

(3) 通过个人资本积累能够消除劳动力移民贫困,减少“回流”,促使其转变为现代市民,以推进城市化进程,并有利于城乡贫困治理。

参考文献:

- [1] 文军. 从季节性流动到劳动力移民: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分化及其系统构成[J]. 探索与争鸣, 2006(1).
- [2] 王桂新. 城市新移民贫困救助和社会保障机制研究[J]. 人口学刊, 2007(3).
- [3] 胡永和. 贫困向城市集中与我国进城农民工的贫困化[J]. 经济体制改革, 2005(6).
- [4] 李实. 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其原因[N]. 中国经济时报, 2003-02-27.
- [5] 樊坚.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贫困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1).
- [6] 吴忠民. 中国究竟有多少贫困人口[N]. 中国经济时报, 2003-05-16.
- [7] 黄平、杜铭那克. 农民工反贫困:城市问题与政策导向[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8] 李建民. 人力资本通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
- [9] 张学英. 政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职能定位[J]. 经济体制改革, 2006(2).
- [10] 张学英. 天津市农民职业培训:知识改变生活[J]. 上海城市发展, 2007(1).
- [11] 张学英. 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J]. 经济纵横, 2005(10).
- [12] 边燕杰、丘海雄. 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2).
- [13] 阎逢柱. 社会资本层面下的我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J]. 当代财经, 2005(10).
- [14] Fukuyama, F., "Trust: the Social val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 [15] Fukuyama, F., "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 IMF Working Paper, 2000, WP/00/74.
- [16] 甘奎奎. 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未来走向[J]. 江汉论坛, 2007(12).

[责任编辑:申凤敏]